

《鬼谷子》的“阴阳”思想与“说谋”论证

廖晨

摘要:“阴阳”是纵横家论证理论的重要依据。以往的研究虽有关“阴阳”的重要性,但未能解答纵横家如何运用“阴阳”思想生成相应论证理论这一问题,也没有深入探索纵横家将“阴阳”作为其理论依据的原因。基于此,在广义论证的研究视域下,以《鬼谷子》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阴阳”的哲学内涵以及“阴”“阳”之间的关系;揭示“阴阳”对其论证理论的影响:“说”(说服)“谋”(谋略)作为纵横家论证理论的核心范畴,“说”有“捭阖”“反应”等论证规则,“谋”作为论证主张,有“阴谋”“阳谋”之分;解释纵横家以“阴阳”为据的原因,认为这与当时国君崇尚“用间(间谍)”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探索“说谋”论证理论与春秋论证实践之渊源。

关键词: 阴阳; 广义论证; 《鬼谷子》; 纵横家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1 问题的提出

《鬼谷子》是纵横家的代表作品,以“说”“谋”为主线,记载了纵横家的论证理论。其中,“阴阳”是纵横家“说谋”论证理论的核心范畴。然而,由于历史原因¹,学界对于《鬼谷子》的研究本就不多,而着眼于《鬼谷子》之“阴阳”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在少有的研究中,郑杰文([17, 18])认为,纵横家眼中的“阴阳”是普遍存在、可以转化、变动的,提出了与之对应的阴阳概遍论、阴阳转化论、柔弱为强说,并指出《鬼谷子》把《老子》的“阴阳化生”学说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其目的在于促使社会事件阴阳转化;彭华([10])以郑杰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其阴阳概遍论、阴阳转化论、柔弱为强说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将“促阴转阳”称为“捭阖”,认为纵横家的阴阳思想体现在“捭阖”的社会活动中;许富宏([14],第88-89、193-194页)认为,纵横家游说之术是阴阳交感化生的结果,并且在游说实践中,也要根据阴阳具有相互交感的特点来进行,其尚“阴”思想,与《老子》

收稿日期: 2020-11-03; 修订日期: 2021-01-30

作者信息: 廖晨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科学学院)
liao chen@sz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广义逻辑的春秋政治论辩研究”(16CZX053)。

¹原因有二,一是部分学者对《鬼谷子》的真伪存疑;二是否定《鬼谷子》的学术价值,甚至认为其理论是诡辩(参见[9])。

十分接近,其中《谋篇》“尚阴”思想直接源于《老子》;屈燕飞([11])认为辩证法是《鬼谷子》一书的理论基础,其中辩证法的运用总原则是以阳求阴,以阴结阳。结合上述研究来看,学界关于纵横家“阴阳”思想的研究,重在分析“阴阳”间的关系、阴阳观的核心地位以及梳理“阴阳”与黄老道家的源流。然而,纵横家如何运用“阴阳”思想构建论证理论?他们又为什么会选择“阴阳”作为其论证理论的依据?这些问题,尚待解答。

近年来,由鞠实儿([7])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广义论证理论,于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视野,并把社会文化纳入逻辑学的研究视域,主张运用社会文化解释途径研究论证,为研究纵横家之“阴阳”提供借鉴。事实上,纵横家将“阴阳”作为其论证理论的重要依据,与当时各国重视“用间”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因此,在广义论证视域下,本文将社会文化背景纳入考察范围,在分析《鬼谷子》之“阴阳”的基础上,考察“阴阳”对纵横家论证理论之论证规则与论证主张的影响,即对“说”与“谋”²的影响,溯源纵横家之“阴阳”及其论证理论。

2 《鬼谷子》中的“阴阳”思想³

据《鬼谷子》所载,纵横家的“阴阳”思想,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肯定了“阴阳”的重要性,认为“阴阳”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二是扩展了“阴阳”的范围,总结出论证诸方面的“阴”与“阳”;三是探讨了“阴”“阳”之间的三种关系,即相反、相求与转化。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鬼谷子》首篇——《捭阖》篇——开篇即对“阴阳”进行了阐述: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

在纵横家看来,虽然万事万物变化无穷,难以捉摸,但是无论它们显现出柔与刚,还是开与闭,抑或张与驰(弛)等表象,归根到底,都是“阴阳”在万物中

²从论证结构上看,纵横家之“说谋”论证理论由“说”和“谋”两大部分组成。其中,“说”为论证方式,具有“捭阖”“反应”等论证规则,与墨家、孟子所采用“辩”(论辩)的论证方式大不相同;“谋”为论证主张,纵横家为听者量身定“谋”,意在促使听者接受论证者的主张,即采纳纵横家提出的“谋”。“说”“谋”二者缺一不可。

³为尽可能如实描述先秦时期纵横家的“阴阳”思想,本文只涉及《鬼谷子》前十一篇内容,即《捭阖》至《决篇》,不考察《符言》《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诸篇,其原因在于《符言》为《管子·九守》混入,后三篇或为唐人所作。如萧登福([13],第69页)认为,自《捭阖》至《决篇》,均为“先秦《鬼谷子》旧物”,而《本经阴符七术》至《中经》是“佛道兴起后的产物”;陈蒲清([1],第150-164页)指出,《捭阖》至《决篇》等十一篇是先秦《鬼谷子》原著,是纵横家的著作,而《符言》是从《管子》混入《鬼谷子》的,卷下(《本经阴符七术》至《中经》)可能为唐人著作。

的具体显现。而圣人之所以能够知晓世间万物存亡的关键，筹策万物的终始，通晓人心的道理，明鉴变化的征兆，其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真理，即“阴阳”。

那么，何为“阴阳”？“阴阳”原对应于方位，“阳”为水北山南，“阴”指水南山北，后被引申为明暗。⁴在《鬼谷子》中，纵横家基于“阴阳”之内涵，将其扩展至论证的诸多方面。

揲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揲阖》）

不难看出，一方面，纵横家根据论证实践中参与者之口的开闭，区分出言说（“揲”）与沉默（“阖”或“默”）两个论证阶段，并用“阳”“阴”分别对应于言说阶段与沉默阶段（倾听阶段）⁵；另一方面，纵横家用“阳”概括事物的积极方面（如长生、喜欲等），以“阴”归纳事物的消极方面（如死亡、诛罚等），以此划分言说内容。这是纵横家将“阴阳”扩展于“说”。

此外，由于“阴阳”是天地万物之法，任何事物都会在“阴阳”的作用下呈现出隐秘与公开、消极与积极的状态，“说”有“阴阳”，“谋”亦有“阴阳”，即“阴谋”“阳谋”之分。

至于“阴”“阳”二者之间的关系，纵横家用“反”字归纳出“阴阳”的三种关系：相反（对立）、反覆（相求）与返回（转化）。我们先从“反”的第一种内涵，即“相反”说起。

《揲阖》曰：“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可知，“益损”“去就”“倍反”体现出“阴阳”的规律；且文中的“益”与“损”、“去”与“就”均为相反关系，“倍”字本有相反之意⁶，故“倍”与“反”也是相反关系。因此，在《鬼谷子》中，“反”体现出“阴”与“阳”的对立关系，具有“相反”的内涵。

接下来，我们来看“反”的第二种内涵——反覆。

一方面，从文本上看，《揲阖》言：“阴阳相求，由揲阖也。”又曰：“揲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故“揲阖”体现出了“阴阳相求”的关系；而“反覆”由“揲阖”所生，也应具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相求关系，因此，“反覆”也体现出了“阴阳相求”的关系。

⁴《说文·阜部》曰：“阳，高、明也。”“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段玉裁注曰：“阴，暗者，闭门也。闭门则为幽暗。故以为高、明之反。”《广雅·释言》《玉篇·阜部》皆言：“阴，暗也。”（[19]，第4536-4539、4543-4547页）

⁵一般来说，在论证实践中，一方言说，一方沉默。沉默，是为了倾听。故对于听者而言，沉默阶段也是倾听阶段，而对于论证者来说，该阶段却为言说阶段，因此，为避免含混，下文将采用论证者视角，以区分论证阶段。

⁶考《管子·山国轨》“有田倍之”；《墨子·耕柱》“夫倍义而乡禄者”；《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倍德则崩”诸注（[19]，第256页）。

另一方面，从字义上看，陈蒲清〔1〕，第14页）认为：“‘反’‘覆’二字，互文成意，有翻来覆去的意思，指对事物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思考”；《飞箝》曰：“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由此可知，“反”与“覆”互文成意、反覆相求。故“反”体现出“阴”与“阳”的相求关系，具有“反覆”的内涵。

关于“反”之第三种内涵——返回，《捭阖》曰：“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还终阴，阴极反（返）阳。”当“阴”“阳”各自达到极致，是可以朝对立方向转化的。纵横家以一个“反”字，表示“阴阳转化”之关系。此外，《反应》言：“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其中的“反”，用法与“阴极反（返）阳”中的一致，均表示返本复出、物极必反。由此看来，纵横家“反”的第三种内涵——返回，显得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纵横家用“反”来展现“阴阳”之间的关系，正如下图所示：

| “阴”与“阳”的关系 | “反”的内涵 |
|------------|--------|
| 阴阳对立 | 相反 |
| 阴阳相求 | 反覆 |
| 阴阳转化 | 返回 |

那么，基于“阴阳”思想，纵横家是如何构建论证理论呢？

3 《鬼谷子》“阴阳”思想下的“说谋”论证理论

3.1 “阴阳”之“说”——由“阴阳”而生的论证规则

纵横家之所以丰富“阴阳”思想，是为了构建由“说”“谋”组成的“说谋”论证理论。我们先审视由“阴阳”生成的论证规则，即“阴阳”之“说”。

首先，纵横家将“阴阳”对应于“说”的两个阶段（言说阶段和倾听阶段），以生成论证规则——“捭阖”。如前所述，言说阶段对应于“捭”，倾听（沉默）阶段对应于“阖”。“捭阖”作为纵横家论证理论中“说”的根本法则，既是“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捭阖》），又是“阴阳”在论证实践中的具象。纵横家“说谋”论证中的诸多理论，也是由“捭阖”而生的，也正如《捭阖》所言：“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捭阖）矣。”关于“捭阖”的运用，可如下图所示〔9〕：

| | | | | | |
|-------|---|-----------|------|---|-------|
| 捭（贵周） | } | 同其情，则捭而出之 | 权衡轻重 | } | 进，为之虑 |
| | | 料其情，则捭而内之 | | | 为之度数 |
| 阖（贵密） | } | 结其诚，则阖而取之 | 为之度数 | } | |
| | | 异其诚，则阖而去之 | | | |

其次，纵横家分析了论证者在言说阶段的言辞，认为它们具有“阴阳”属性⁷，采用不同属性的言辞，会对听者产生不同的效果：

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捭阖》）

纵横家区分了言说内容，将具有“阳”属性的言辞称为“始”，“阴”属性的言辞视为“终”。在论证实践中，论证者讲“阳”属性的言辞，会促进听者采取相应的行动；说“阴”属性的言辞，会阻止听者实施对应的策略。进一步讲，论证者要让听者接受其主张，唯有破除听者之成见，让听者意识到坚持固有主张的危害，以及论证者所提主张之优越性，方能让听者诚然接受论证者的主张，可谓是无“始”必无“终”，无“终”定无“始”。因此，论证者的言辞必须满足“阴阳”相求，有“阴”必有“阳”，二者缺一不可。

再次，除了言辞具有“阴阳”属性，听者也具有“阴阳”属性。因此，在论证实践中，针对不同属性的听者，论证者所采用的言说内容要相应变化。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捭阖》）

尹桐阳注曰：“此‘阳’‘阴’，斥人性情而言。”俞樾曰：“韩非《难一》曰：‘凡对问者，有因问小大缓急而对也。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则明主弗受也。’韩非之说盖本鬼谷者。”（[15]，第19页）如前所述，长生、富贵、崇高等具有“阳”属性；贫贱、失意、卑小等均有“阴”属性。因此，论证者面对具有富贵、长寿等“阳”属性的听者时，在言说内容的选择上，应重点把握“崇高”二字；反之，对于具有穷苦、失意等“阴”属性的听者，则要与“卑小”紧密结合。总之，在论证实践中，论证者需仔细考察听者的性质，再决定具体的言说内容，故如下图所示：

| | | 阳 | 阴 |
|------|------|------------|-------------|
| 说 | 阶段 → | 捭 | 阖 |
| | 内容 { | { 长生、安乐、富贵 | 死亡、忧患、贫贱 |
| | | { 尊荣、显名、爱好 | 苦辱、弃损、亡利 |
| | | { 财利、得意、喜欲 | 失意、有害、刑戮、诛罚 |
| 目的 → | 始其事 | 终其谋 | |
| 对象 → | 依崇高 | 依卑小 | |

最后，纵横家基于“阴阳”的三种关系，生成了相应论证规则，并将其称之为“反应”。

⁷如前文所述，有关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等内容的言辞，具有“阳”属性；涉及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等内容的言辞，具有“阴”属性。

何谓“反应”?《反应》云:“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在论证实践中,论证者与听者如“言有不合”,论证者需运用“反应”之论证规则,求得听者之回应,从而打破僵局,将“不合”变为“合”,故“反应”乃是以“反”求“应”。

具体来说,“反应”的论证规则有三条,一是“捭反”之术,体现“阴阳”的相反关系。《捭阖》曰:“审定有无与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陶弘景注曰:“凡臣言事者,君则微排抑其所言,拨动而反难之,以求其实情;实情既得又自闭藏而拨动彼,以求其所言之利如何耳。”([15],第8页)概言之,论证者可采取反对听者的策略,以获得听者之回应。依据文本,与“捭反”相对的另一种论证方式是“随其嗜欲”,依照文意,二者实为一反一顺,与“阴”“阳”相对;且“捭反”之“反”亦有“相反”之意。故“捭反”的理论依据在于“阴阳”相对。

二是“反覆”之术,体现“阴阳”的相求关系。

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反应》)

陶弘景注曰:“欲以知来,先以观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于己。故能举无遗策,动必成功。”([15],第24页)在论证实践中,论证者如遇言语不合,亦可采用“反覆”之术,即“观往验来”“知古知今”以及“知己知彼”,以明确听者虚实。从规则上看,“往”与“来”“古”和“今”“己”与“彼”皆为相求关系,且“反”“覆”互文成意,符合“阴阳相求”之理。据此,“反覆”之术的理论依据在于“阴阳”相求。

三是“反听”之术,体现“阴阳”间的相互转化关系。

常持其网驱之,其不言无比,乃为之变。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己反往,彼覆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袭之,反之覆之,万事不失其辞。圣人所诱愚智,事皆不疑。故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远听之……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反应》)

在论证实践中,如遇听者不言,论证者需要运用“反听”之术,通过变换“象比”的方式,让听者“开情”,以获取听者的真实情况。其中,“象”为意象⁸,论证者借助于听者已知之事,由此在听者心中成象,进而描述听者未知之事,故象

⁸《说文解字·象部》曰:“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凡象之属皆从象。”《韩非子·解老》载:“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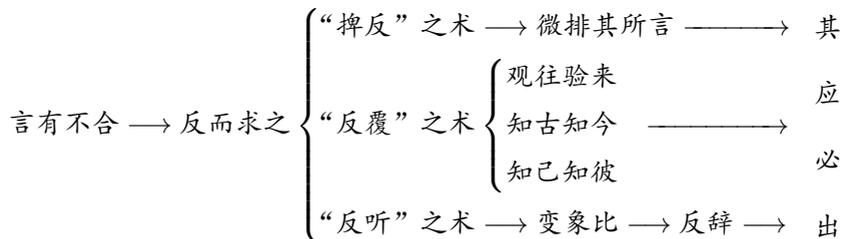
征、比喻等修辞方式均为“象”。“比”指类似于排比的修辞方式⁹，只是没有现代修辞学对排比的严格规定，要求必须三句或三句以上相似语句并排而行，故排比、墨家的“侷”式推理，均可称为“比”。

《反应》曰：“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远听之。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故“反听”之依据，与下文“欲闻其声反默”有关。如前所述，“欲闻其声反默”中的“反”，意为“返回”，体现出“阴阳”之间的相互转化。因此，纵横家基于“阴阳”转化，生成“反听”之术。

综上，“反应”的三种论证规则与“阴阳”的关系，可如下图所示：



概言之，“反应”的论证规则，可如下所示：



由此可见，“阴阳”与“说”密不可分，纵横家以“阴阳”为据，生成“掉反”“反应”等论证规则。

3.2 “阴阳”之“谋”——由“阴阳”而生的论证主张

受纵横家阴阳观的影响，“谋”亦有“阴阳”之分：

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于匿。”（《谋篇》）

⁹参见“比”字在甲骨文、金文中演变（[5]，第671-672页）；《说文解字·比部》曰：“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凡比之属皆从比”；《墨子·小取》言：“侷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反应》篇讲“比目之鱼”。

纵横家认为,采用“阴”(众人之所不能知,众人之所不能见)的方式易于解决问题,是圣人之道、智者之道;选用“阳”(众人之所能知,众人之所能见)的方式难以处理事务,是愚人之道。“谋”作为智慧的载体,是纵横家为帮助国君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具体方法,应有“阴阳”之分。许富宏([15],第147页)指出,《鬼谷子》此处(圣人之制道,在隐于匿)揭示了谋略的原则,即在于“隐匿于阴”,谋之于阴而勿让人知,则谋可成,此即所谓“阴”谋。从文本上看,圣人之道在于“阴”,而圣人制道的方式又是“隐于匿”,故“阴”与“隐”“匿”二字密切相关。何为“隐”?众人所不能知。何谓“匿”?众人所不能见。因此,“谋”受“阴”的影响,生成“阴谋”,具有“隐”“匿”之特性,即众人所不能知、不能见。反之,与“阴谋”相对,“阳谋”的特点则在于众人所能知、能见。在“阴谋”与“阳谋”之间,纵横家更推崇“阴谋”,认为“阴”是圣人制道的法则,体现出纵横家之“贵阴”思想。那么,“隐”“匿”在“阴谋”中是如何作用的?

其一,在谋略的生成层面,为确保众人所不能知,纵横家设谋,以“奇谋”为标准。《谋篇》曰:“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从“谋”的生成进程来看,纵横家先要了解国君的实际情况,然后据此思索出具有等级之分(上、中、下)的三种谋略(三仪),通过对比参照,最终形成“奇谋”。关于“奇”,《谋篇》讲:“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不难看出,纵横家强调“奇”是制定谋略的根本要求。进一步讲,若是纵横家未能提出“奇谋”,则不可能说服国君,这是因为纵横家所言之“谋”,皆是国君所能知的。故“谋”之道,在于“奇”。此外,从字义上看,“奇”意为异于平常。何为异于平常?则必为人所不知,若为人所尽知,又怎能称之为奇?故“奇”与“隐”不谋而合,具有“阴”之特性。于是,“谋”的生成,以“奇”为标准,“奇”为“阴”之体现,“奇谋”即为“阴谋”,具有众人所不能知(隐)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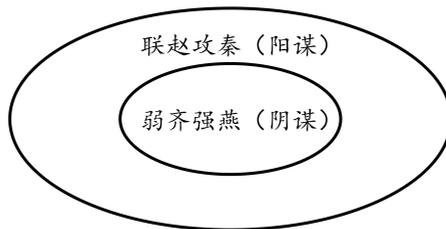
其二,在谋略的运用层面,为确保众人所不能见,纵横家施谋,以“密谋”为标准。《摩篇》讲:“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之。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纵横家认为,“谋”之难,在于制定时要考虑周全,运用时要隐秘行事。为解决这一难题,确保周密,纵横家需将谋略说与亲密无间之人。故《谋篇》总结道:“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而无隙者也。”纵横家施“谋”,只说与一人,此人之外,众人不能见“谋”,进而保证谋略施行于暗处,与“匿”相符,赋予谋略“阴”之属性。因此,“谋”之用,在于“匿”。诚如《韩非子·说难》所言:“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总结上述两点,“谋”受“阴阳”影响,有“阴谋”“阳谋”之分。相较于“阳谋”,纵横家更为推崇“阴谋”。这一点,与“说”之“阴阳”,大不相同。这是因为“说”中的“阴阳”各有所用,“阳”为“始其事”,“阴”为“终其谋”。因此,

可以断定，纵横家在“说”中讲求“阴阳”调和，而在“谋”中崇尚“阴谋”。“阴阳”之“谋”，可如下图所示：

| | | | |
|---|----|----------|----------------|
| | | 阳 | 阴（推崇） |
| { | 评价 | 愚人之道 | 圣人（智者）之道 |
| | 生成 | 众人之所能知 | 众人之所不能知（隐（奇谋）） |
| | 运用 | 众人之所能见 | 众人之所不能见（匿（密谋）） |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中，“阴阳”共生于纵横家所设之“谋”，“阴谋”之外，有“阳谋”；“阳谋”之内，有“阴谋”。以苏秦联合五国攻秦¹⁰为例，杨宽（[16]，第417页）指出，苏秦推翻秦、齐连横攻灭赵国的计划，发动齐、赵联合五国而合纵攻秦，其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挽救赵国，而是为了将来实现燕联合秦、赵攻破齐国的“大事”，其原因在于秦、赵、齐三大强国鼎立，唯有造成秦、赵两强合纵攻齐的局势，才有可能把齐国攻破，若是秦、齐两强连横而攻赵，一旦赵国被灭，齐国的国力势必更加强大，对于燕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此，苏秦为实施这一谋略，向齐湣王提出“两帝立，约伐赵”（《战国策·苏秦谓齐王》），不如伐宋之利，建议取消帝号，使得“天下爱齐而憎秦”（《苏秦谓齐王》）。最终，齐湣王接受苏秦的主张。此例中，苏秦施“谋”的终极主张，在于弱齐强燕，诚然，该主张断然不能让齐湣王知道。苏秦之“谋”，从“阳”的层面看，是为了强大齐国，但从“阴”的角度看，确是弱齐强燕。苏秦只言“谋”之“阳”（联赵攻秦），却不言“谋”之“阴”（弱齐强燕），正如下图所示：



苏秦之“谋”，“阳”为强齐，“阴”为强燕

后来，齐王察觉苏秦的“阴谋”，车裂苏秦于市¹¹。故《吕氏春秋·知度》言：“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淮南子·说林》曰：“苏秦以百诞

¹⁰《史记·苏秦列传》载：“是六国从（纵）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纵）约长，并相六国。”杨宽（[16]，第417页）认为这是后世策士的夸张，应为五国攻秦，而非六国。

¹¹《战国策·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载：“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伴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

成一诚。”由此可见，谋略既有“阴”的层面，又有“阳”的层面，而“阴谋”才是纵横家的终极主张。因此，我们不能将《谋篇》所言的“愚人之道阳”，简单地理解为纵横家反对将谋略施于明处，而应理解为，纵横家反对将“阳谋”中所包含的“阴谋”，公之于众。倘若苏秦将弱齐强燕告知齐王，就是“愚人之道”了。故《摩篇》讲：“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

综上所述，基于“阴阳”思想，纵横家总结出由“说”与“谋”构成的论证理论。那么，纵横家为什么会选择“阴阳”作为其论证理论的立论依据呢？

4 《鬼谷子》之“阴阳”溯源——基于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各持其说，皆有理论渊源，荀子总结为“持之有故”（《荀子·非十二子》）。纵横家也不例外，《鬼谷子》开篇即言“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捭阖》），后以“阴阳”为据。那么，在各派众多立论依据中，纵横家为什么会选择“阴阳”呢？其原因，概言之，当时各国之君崇尚“用间”，在此背景下，纵横家应运而生，行间谍之事，而间谍活动历来重视隐秘，这就使得纵横家之理论与“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使其以“阴阳”立论。

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当时七国争雄，战事频仍，战争规模日益扩大¹²，战争代价¹³也随之日益高昂，给百姓、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为降低战争成本，各国之君也逐渐意识到，相较于发动战争，间谍的使用，成本更为低廉¹⁴，却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正所谓“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兵法·用间》）因此，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各国之君非常重视“用间”，并且付诸行动，如《史记·秦本纪》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刻石记功：“阴通间使，以事合从（纵），行为辟方。”这一方面表明，“用间”“合纵”¹⁵是秦国成就霸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李斯（[8]，第173页）所言：“秦人通过‘用间’成功地瓦解了敌国合纵联盟，减少了统一过程中的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纵横家出使各国，明为外使，暗为间使。

从实践来看，苏秦、张仪作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确行间谍之事：如前所述，苏秦事发，被车裂于市，成为燕国之“死间”¹⁶；张仪曾为秦相，后被秦惠王“罢

¹²据杨宽考证，春秋战国间，用兵的数量还在十万左右；到战国中期以后，用兵的数量甚至多达五六十万。（[16]，第355页）

¹³《孙子兵法·用间》言：“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战国策·楚围雍氏五月》讲：“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

¹⁴如《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秦王资助顿弱万金，赴韩、魏、燕、赵从事间谍活动，参见《战国策·秦王欲见顿弱》：“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碑（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

¹⁵参见《韩非子·五蠹》：“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¹⁶《孙子兵法·用间》载：“故用间有五：有因（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

免”，奔赴魏国，从事谍报活动¹⁷，是秦国之“生间”¹⁸。

从文本来看，《鬼谷子》也与“用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鬼谷子》曾为日本情报人员的必读书目（[2]，作者序言，第1页）；《内捷》讲“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此术可用于间谍活动中的拉拢渗透，结交权贵¹⁹；《忤合》讲“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揭示了纵横家被世人误以为是“朝秦暮楚”“事无定主”的原因，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身负“间使”的特殊使命，苏秦、张仪终其一生，各为其主——燕国、秦国，足以证明他们并没有“朝秦暮楚”，亦符合《忤合》篇“计谋不两忠”的论述。《鬼谷子》中相关论述亦不胜枚举，至少可以说明纵横家之学可用于谍报活动。

依据间谍活动的要求，隐秘²⁰行动才是重中之重，正如《谋篇》所言：“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制道，在隐与匿。”纵横家唯有行事隐秘，方能获取情报，施行“阴谋”，最后功成身退，所以《摩篇》讲：“微而去之，是谓塞窞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当时，诸子百家多以《诗》《书》为据，所言乃是光明正大之道，纵横家若以此为据，则与本派所行隐秘、阴暗之事不相匹配。因此，《诗》《书》诸论，不能作为纵横家的立论依据。那么，面对这种情况，纵横家需要一种重视隐秘、阴暗的学说，作为其理论依据。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贵阴柔的思想，与纵横家之立论诉求不谋而合，学界亦有纵横家之“阴阳”源于黄老道家之定论。从先秦“阴阳”演化进程来看，笼统地讲，商周时期已有“阴阳”思想²¹；至春秋时期发生演变：老子著《道德经》，崇尚阴柔，孔子作《易传》，崇尚刚强（[10]，第176—177页）；到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创“五德终始”之说，后被秦始皇采用²²。苏秦或为《鬼谷子》之作者²³，

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此外，苏秦因“反间”罪而死，亦能从侧面证实其事间谍活动，见《史记·苏秦列传》：“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诖学其术。”

¹⁷《史记·张仪列传》曰：“（张仪）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

¹⁸《孙子兵法·用间》载：“生间者，反报也。”杜佑注曰：“择己有贤才智谋，能自开通于敌之亲贵，察其动静，知其事计，彼所为已知其实，还以报我，故曰生间。”（[12]，第296页）

¹⁹参《孙子兵法·用间》：“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梅尧臣注曰：“因其官属，结而用之。”（[12]，第292页）

²⁰《孙子兵法·用间》曰：“事莫密于间。”杜佑注曰：“间事不密，则为己害。”梅尧臣注曰：“几事不密，则害成。”（[12]，第297页）

²¹井上聪（[6]）考商代干名制度、周代丧礼及用鼎等制度，认为商周时期已有“阴阳”思想，主要体现为“阴阳”转化，并呈现出循环结构。

²²《史记·封禅书》载：“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运。”《汉书·郊祀志》言：“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

²³考《鬼谷子》，《汉志》无，始见于《隋志》，曰：“《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后《旧唐书·经籍志·纵横家》将作者改为苏秦，云：“《鬼谷子》二卷，苏秦撰。”《新唐书·艺文志·纵横家》载：“《鬼谷子》二卷，苏秦。”故《四库提要》称：“旧本题鬼谷子撰，《唐志》则以为苏秦撰，莫能详也。”

有出使齐国的经历，或许有闻邹子之说²⁴；儒家为当时显学，孔子之说，自是广为流传；战国时期，帛书《黄帝四经》有贵阴柔之说²⁵，韩非子著有《解老》《喻老》，黄老之说，亦盛于当时。由此推测，当时或许流传着三种“阴阳”思想，而面对这些思想，纵横家基于其立论诉求，选择黄老之说，这也从侧面说明，纵横家是有所考量，而非随意择取。

当时各国之君重视“用间”的社会文化背景，为纵横家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由于纵横家身份特殊，任务艰巨，其思想相较于其他学派，显得更为注重对“阴”的研究，其论证理论之源流，或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老子。当然，除了春秋时期的哲学思想，其论证实践也为纵横家论证理论之构建，提供借鉴。

5 “说谋”论证理论之溯源

理论源于实践，纵横家之“说谋”论证理论，离不开自身的论证实践，更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证实践。从实践上看，纵横家周游列国，主张依靠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称霸，其受众必是各国之君，而非平民百姓。与百姓言，即使失败，也不会招致杀身之祸；国君则不然，早在春秋时期，人臣因说服失败而惨遭祸患的事例就不胜枚举。因此，为确保听者（国君）欣然接受己方主张，纵横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考察听者的特殊性，并发展出相应的论证理论。

纵横家认为，让听者全盘接受说者的主张，是“说”之难，故《摩篇》言：“说莫难于悉听。”为确保听者言听计从，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情”字，即说者所言之事与所提主张，均要符合听者的真实情况，故《摩篇》总结道：“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需要注意的是，战国诸子总结春秋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亦有相似之论，如韩非分析百里奚、关其思、弥子瑕等人的案例，认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说谈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说难》）吕不韦及其门客考察管仲遗言、桓公溺臣，指出：“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化，奚由相得？无由相得，说者虽工，不能喻矣……无由接，固却其忠言，而爱其所尊贵也。”（《吕氏春秋·知接》）这表明先秦诸子已经意识到，“情”在论证实践中的重要性。所以，《内捷》曰：“不见其类而说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开。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万物。”由此可见，纵横家将“得情”置于论证实践的先决位置，基于听者的特殊性，为了“得情”，势必要对听者因素展开详细分析。

²⁴据《史记·封禅书》载，邹子之徒创“五德终始”之说，起于齐威、宣之时；考《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曾“东事师于齐”，又见齐宣王、齐湣王。由此推测，苏秦极有可能听闻“五德终始”之说。

²⁵如《经法·四度》载：“柔弱者无罪而几，不及而翟，是胃（谓）柔弱。刚正而口者口口而不廉。”《十六经·雌雄节》曰：“皇后屯磨（历）吉凶之常，以辩（辨）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乡（向）。寃敖（傲）骄居（倨），是胃（谓）雄节；共（恭）验（俭），是胃（谓）雌节。”又曰：“凡人好用雄节，是胃（谓）方（妨）生。大人则毁，小人则亡……凡人好用【雌节】，是胃（谓）承禄。富者则昌，贫者则谷。”（[3]，第52、70页）

其实,广泛存在于春秋时期的论证实践就已表明,论证者(说者)早已意识到受众(听者)因素对于论证成败的影响,如同一论证者针对同一事件,面对不同的受众,会使用不同的说辞([4])。纵横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听者的考察更为细致:一方面,继承了前人针对不同听者,采用不同说辞的论证策略²⁶;另一方面,总结出“量权”²⁷“揣情”²⁸等方法,进而“得情”,为“说谋”论证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纵观全文,纵横家之“说谋”论证理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方面,受黄老道家之“阴阳”思想影响,生成“捭阖”“反应”等论证规则,以及有“阴谋”“阳谋”之分的论证主张;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论证实践,也为该理论提供宝贵经验。这表明战国诸子的逻辑理论有其产生的基础,而春秋时期的相关思想观念是探究上述基础的重要资源。([4],第30页)

此外,纵横家之“说谋”论证理论是基于中国特定时期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论证理论。试想战国时期并无“用间”的社会文化背景,苏秦、张仪——作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也不会明为外使,暗为间谍,自不会以“阴阳”为据,发展出“说谋”论证理论了。诚然,若是缺失了这一重要背景,纵横家也不会列席于战国诸子之中,更不会在战国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也为解释纵横家一脉,自战国以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埋下了伏笔。因此,在广义论证视域下,本研究将社会文化背景纳入研究范围,分析其对论证的影响,这有利于展现我国先秦时期论证实践以及论证理论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 [1] 陈蒲清,鬼谷子详解,2005年,长沙:岳麓书社。
- [2] 大桥武夫(著);房立中(译),鬼谷子与经营谋略,1992年,北京:学苑出版社。
- [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1980年,北京:文物出版社。
- [4] 何杨,“广义逻辑视野下的《左传》论辩研究——以受众因素分析为例”,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第29-34页。
- [5] 季旭升,说文新证,2010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²⁶《权篇》曰:“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

²⁷“量权”之术是对听者所处国家及周边环境的考察,涉及经济、人口、资源、地缘、政治、文化、外交、社会等诸多因素。《揣篇》曰:“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辩。能知此者,是谓量权。”又曰:“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

²⁸“揣情”之术是说者在考察听者心理(主要是喜与惧)的基础上,合理运用说辞,强化听者心理(喜惧),进而探知听者的真实所想。《揣篇》曰:“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又曰:“说人主,则当审揣情。”

- [6] 井上聪, 先秦阴阳五行, 1997年,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7] 鞠实儿, “广义论证的理论与方法”, 逻辑学研究, 2020年第1期, 第1-27页。
- [8] 李斯, “秦统一进程的间谍史考察”,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3期, 第170-174页。
- [9] 廖晨, “纵横家说理理论研究——以《鬼谷子·捭阖》为例”,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年第21期, 第150-153页。
- [10] 彭华, 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 2011年,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 [11] 屈燕飞, “《鬼谷子》游说思想探析”, 宗教学研究, 2016年第3期, 第250-257页。
- [12] 孙武(撰); 曹操等(注); 杨丙安(校理),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 1999年, 北京: 中华书局。
- [13] 萧登福, 鬼谷子研究, 1984年, 台北: 文津出版社。
- [14] 许富宏, 《鬼谷子》研究, 2008年,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5] 许富宏, 鬼谷子集校集注, 2014年, 北京: 中华书局。
- [16] 杨宽, 战国史, 2016年,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7] 郑杰文, “纵横家的阴阳转化哲学观”, 齐鲁学刊, 1997年第6期, 第38-44页。
- [18] 郑杰文, “《鬼谷子》哲学与《老子》哲学”, 齐鲁学刊, 1999年第1期, 第3-5页。
- [19] 宗福邦, 陈世铨, 萧海波(主编), 故训汇纂(两卷本), 2007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 执子)

Guiguzi's Yin Yang Thought and Argumentation of the Shuo Mou Theory

Chen Liao

Abstract

Yin Yang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olitical strategists to argumentation theory.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Yin Yang, they fail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he political strategists used the thought of Yin Yang to generate corresponding argumentation theories, nor did they revealed the reasons why political strategists regard Yin Yang as their theoretical basis. Based on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argumentation, taking *Guiguz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Yin Yang in *Guiguzi* and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t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Yin Yang on his argumentation theory. Among them, “Shuo” (persuading), “Mou” (strategy), are the core category of the political strategists’ argumentation theory, and they are influenced by Yin Yang: “Shuo” contains argumentation rules such as “Baihe” and “Fanying”. As the propositions of argumentation, “Mou” can be divided in to “Yang Mou” and “Yin Mou”. It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political strategists took Yin Yang as their basis, and deems that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 when the monarch advocated “using estranging”. It explores the origin of argumentation of the Shuo Mou theory and argumentative practic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